

国制与地区

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论析*

肖 晞 杨晨曦

[摘要] 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由来已久,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而其独特的历史更是加深了巴斯克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不同历史时期的西班牙统治者和当代的民主政府对巴斯克地区的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的变迁。产生于佛朗哥极权统治时期的“埃塔”问题已经成为了目前西班牙自治制度的最大体制外毒瘤,久久不能愈合。本文阐述了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的产生原因、发展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思考。希冀通过对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这一典型性极强的案例进行研究,对我国处理类似问题以警示和借鉴。

[关键词] 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埃塔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0)05-0063-68

2009年7月,西班牙巴斯克极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恐怖主义组织“埃塔”成立整整50年。为此,“埃塔”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近50年来,历届西班牙政府均对“埃塔”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打击和压制政策。但时至今日,巴斯克极端分离主义仍是西班牙国内政治生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其中,既有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深厚历史的影响,也有西班牙独特的“地区”特点的影响;同时还有西班牙政府政策失误的问题。^[1] 本文通过对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着重突出对埃塔问题的评析。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样面对着个别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威胁。而极少数分离势力已经严重极端化,成为了恐怖主义组织。因此,对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这一典型性极强的案例进行研究,对我国处理此类问题有着很强的警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一、民主改革前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的历史脉络

探讨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的前提是廓清其民族主义赖以形成和保持的各种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位于西班牙北部,面临比斯开湾,海上交通便利;东临比利牛斯山,面积7235平方公里,西

班牙的巴斯克人聚居于此。“毫无疑问,正是比利牛斯山的无法逾越给了著名的巴斯克人从史前时期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机会。”^[2] 自给性很强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巴斯克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厚重的自然地理基础。

从经济、文化层面来看,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都落后于主体民族的情况不同,巴斯克地方经济长期大大优于西班牙主体民族。^[3] 语言是巴斯克民族问题产生的另一个深刻原因。语言是民族的根本特征,民族语言的形成标志着民族的形成。^[4] 巴斯克语是整个西欧的各种语言中惟一的非印欧语系语言,事实上,人们找不到它同目前已知的任何语系的相关联系。这一事实促使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欧洲大陆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5] 上述诸因素为巴斯克民族主义的形成与保持奠定了基础,而巴斯克人独特的历史则为其民族主义的巩固与加强提供了巨大支持力量。

从历史上看,自15、16世纪直至19世纪的末期,西班牙巴斯克人历史的独特性显露无遗:其一,是西班牙巴斯克人“集团贵族”(Aristocracia Vasca o Grupo Aristocrático)身份的形成与巩固;其二,执行了“福埃罗斯”(Fueros)制度。^[6]

集团贵族这一现象是西班牙巴斯克人独有的。集

* 本文系肖晞主持的2009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西班牙民族自治制度研究》(项目编号:GM-2009-53)的阶段性成果。

团贵族是从西班牙文直译过来的,意思是任何能证明自己是巴斯克族父母在比斯开和吉普斯夸或者在阿拉瓦和纳瓦拉山谷所生的巴斯克人,均因血统纯真而自动地被认为高贵。^[7]西班牙巴斯克人集团贵族身份的最初获得是在11世纪初,普遍扩散开来则是在15、16世纪。由于集团贵族身份的获得,西班牙巴斯克人获得了说明他们可以免除赋税、兵役、自由携带武器甚至是与外国订立协议等特权的有利论据。这就为巴斯克民族的同一性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巴斯克人之所以会获得集团贵族这样一个重要的身份,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古代西班牙的主要领土在长期的外族统治过程中,本土居民已经很难证明其血统纯正,而巴斯克地区却没有被占领,巴斯克人的血统纯正性查之有据;^[8]其二,13世纪西班牙重新独立后,其北部领土依然面临着异族的威胁,西班牙王朝必须依靠巴斯克的力量来保卫其北部边境,因而赋予其族人集团贵族的封号。

有鉴于巴斯克民族的特殊性,自13世纪巴斯克人的部分领土并入西班牙以来,西班牙王国政府就与其巴斯克地区达成协议,执行“福埃罗斯”制度。在此制度下,巴斯克人在贸易、税收及军事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主权和特权,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卡尔罗斯战争^[9](1833—1839)之后,方开始逐渐被废除。^[10]1876年“福埃罗斯”制度被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协议”(conciertos económicos),其核心是巴斯克地区的赋税要低于其他地区。由于西班牙王国对巴斯克地区实行的宽容政策,直至19世纪末以前,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问题尚不突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西班牙民族国家的逐步建立,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加强,而地方民族主义力量也在这一时期快速崛起,两者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碰撞不断。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也凸显出来。

自佛朗哥政权于1936年建立之后,西班牙进入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这一时期在西班牙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西班牙民族主义的统一思想和西班牙主义思想。在这两种思想的支配下,佛朗哥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同化政策。佛朗哥政权建立后,反映巴斯克地区特殊性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遭到了严厉的禁止。巴斯克的民族主义者不是被流放,就是被关进监狱。佛朗哥统治时期,全国被监禁的政治犯中近一半是巴斯克人。

20世纪50年代末,西班牙民族问题重新公开化。

在巴斯克地区,同一性感情同样从未消失,独裁政府的民族压制政策直接催生了巴斯克民族分裂势力“埃塔”。埃塔作为一个集团出现于1959年7月31日,埃塔的巴斯克语为“Euskadi Ta Askatasuna”,意为“巴斯克人的国家和自由”。埃塔在成立之初的目标是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反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

埃塔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地使用武力反抗佛朗哥政权的同化政策。其在1961年制造了一起火车出轨事件,此事对佛朗哥政权的震动很大。从1968年起,埃塔开始把谋杀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11]此后,埃塔于1973年12月炸死了时任西班牙首相的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并于1974年9月在马德里一家咖啡馆制造了大规模袭击。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埃塔在西班牙境内尤其是巴斯克地区很有群众基础,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埃塔在形成阶段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广泛的动员能力。

二、西班牙民主改革与巴斯克自治的确立

简单梳理西班牙中央与巴斯克地区之间府际关系的历史变迁,对于理解西班牙民主改革与巴斯克自治的确立是非常必要的。论及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变迁,首先要提到的依然是巴斯克人的集团贵族身份及“福埃罗斯”制度。巴斯克人经常援用集团贵族这个词来支持他们在西班牙国内享有特权地位的要求。无论巴斯克人和政府什么时候发生冲突,巴斯克人肯定会提到他们是集团贵族,以此来强调他们拥有法律上和财政上的自主权。^[12]

“福埃罗斯”制度的本质在于巴斯克人按照地区习惯法施政。历史地看,延绵于17、18世纪的这种制度是巴斯克人集团贵族政治特权的一种延续。在这种制度下,巴斯克人拥有从语言、文化到财政、税收再到军事方面的广泛自治权利和政治、经济特权。在“福埃罗斯”制度下,西班牙国王不仅要宣誓效忠王国宪法,还要宣誓效忠地方习惯法。19世纪的两次卡尔罗斯战争的结果直接导致了“福埃罗斯”制的终结。巴斯克作为战争失利一方的成员,与西班牙中央政府达成了“经济协议”,以此作为调整两者之间关系的法律文件。而19世纪恰恰是建立统一的现代西班牙民族国家进程中的快速发展时期。1876年末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强制推行的西班牙化的政策推动了巴斯克分离主义势力的快速崛起。

1936年佛朗哥军队占领巴斯克地区,巴斯克自治

就此被废除,全部特权被取消。在佛朗哥统治时期,我们似乎无法认为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巴斯克地区之间存在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府际关系”,因为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本身很难被认为是现代政治。

了解了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巴斯克地区之间府际关系的历史变迁,我们便不难理解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及巴斯克各政治派别对巴斯克问题的态度以及民主改革过程中巴斯克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及其结果。

西班牙民主改革期间,在巴斯克地位问题上,巴斯克人当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绝大多数巴斯克人主张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争取尽可能多的自治权利,反对分裂。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巴斯克人主张巴斯克自决,独立于西班牙,持这种主张的主要政党有“人民团结”和“巴斯克左派”等。事实上,这部分巴斯克人之所以坚持要求独立于西班牙,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坚持,才能有所选择:究竟是继续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还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真正偏执于独立的只有极端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者。最具代表性的埃塔组织即主张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区从两国独立出来,成立“巴斯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3]

即便是在极端的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埃塔内部,也存在两派意见。1966年在埃塔第五次会议上,该组织从意识形态上分为两派,民族主义派坚持传统自治目标;以争取独立为目标的理想主义者则主张采用恐怖活动等极端主义手段来达到目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后者一直处于上风,他们交替进行暴力和政治活动,并于1976年宣布自己是独立组织,从此,埃塔的主流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14]

当时的西班牙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也面临着各种考验。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国内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各政治派别分歧很大。“西班牙历史上发生了许多国民对抗的事件……另外一个事实是,西班牙的转型是在极高烈度的政治暴力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的暴力活动既来自极左派,也来自极右派。从独裁体制下沿袭下来的警察体系,习惯了以暴力的方式对待问题,造成了许多死亡事件。当时还发生了几起政变图谋,为人们熟知的就是1981年特赫罗中校发动的政变,但除此之外还有几次流产的政变。极右派当时的行为也非常暴力,杀死了很多人;而属于极左翼的一些派别,尤其是巴斯克恐怖主义组织‘埃塔’,在当时杀害的人要比在独裁统治下更多。”^[15]

但是,西班牙国内各主要政党和政治力量在保持统一的西班牙国家的领土完整、解决国家内部的恐怖

主义问题方面保持了一致。并且,根据当时进行的民意调查,人们普遍认为巴斯克地区的分离必定会产生强烈昭示作用,在西班牙甚至是整个西欧产生严重的连锁反应。因此,包括西班牙军方在内的西班牙社会各界普遍反对巴斯克地区的分离。

在这种情况下,巴斯克地区的主要政党——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提出了恢复“福埃罗斯”制度的主张。此外,该党还声称自己“与埃塔没有任何联系,并谴责其暴力行径,尽管我们了解他们。”^[16]这一举动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务实的态度。在新宪法修订的过程中,在宪法的补充条款上写道:“宪法保障并尊重‘福埃罗斯’领地的历史权力,将在宪法和自治地位的框架内恢复这一制度。”这意味着对“福埃罗斯”制度的有条件的恢复。其条件在于,拒绝将这一制度恢复到17、18世纪时的高度,国王不可能像彼时那样在宣誓效忠宪法的同时也效忠“福埃罗斯”制度。

新宪法的这种规定,使得新宪法在巴斯克地区的民调支持率远远低于全国其他地区。为了平抚巴斯克人的不满情绪,时任西班牙政府首相的苏亚雷斯不得不对其巴斯克政策进行调整,赋予这一地区更多的自治权利。西班牙政府遵照宪法第151条的规定,于1979年10月在巴斯克地区实行了确立其永久自治地位的全民投票,使巴斯克地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力。由此,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作为统一的西班牙国家的一个自治区的地位最终得到确立。

三、民主改革后的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及其新动向

民族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创立是西班牙这次改革的主要功绩之一。它既保持了西班牙领土和国家的完整统一,又大大缓解了佛朗哥时期急剧激化的西班牙国内民族矛盾。应该认为,在民主改革和巴斯克地区自治制度建立之后的岁月里,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情绪在绝大多数巴斯克人那里都得到了消解。

但是,巴斯克地区自治体制的建立并没有平息少数巴斯克极端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的不满情绪。少数极端主义者认为,民主改革中形成的宪法在本质上不是在承认民族差异,而是在维护西班牙民族主义。为此,他们进一步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乃至要求独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使用暴力,甚至是恐怖主义手段。民主改革后的埃塔组织彻底地蜕变成了恐怖主义组织。

埃塔组织并不满足于巴斯克地区在西班牙宪法框

架内的自治,他们不断地通过恐怖袭击向西班牙政府施加压力。1980年巴斯克自治区正式建立后,埃塔当年便在西班牙各地制造了数十起暴力袭击,致使数百人丧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埃塔策划了近3000起恐怖事件,杀害了900多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亿美元。^[17]为了获得必需的活动经费,他们不断通过勒索、恐吓的方式来强迫巴斯克人缴纳所谓的“革命税”,除了在巴斯克的农村地区向普通民众敲竹杠外,^[18]还包括绑架企业家,逼他们缴税,导致埃塔民心尽失,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动摇。

面对民主改革后依旧猖獗的埃塔恐怖主义组织,西班牙历届政府都对其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打击措施,西班牙前任首相阿斯纳尔(Aznar)曾经强调:“对付恐怖组织的唯一办法就是将他们彻底消灭。”^[19]同时,对于宪法赋予巴斯克人的正当权利,历届西班牙政府都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并且每当埃塔宣布停火,西班牙政府都与其进行了政治接触。

多年来,西班牙为打击埃塔恐怖主义组织投入了巨大力量,甚至深入法国境内对埃塔核心成员实施逮捕和审讯。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埃塔恐怖主义组织的打击力度,重创了埃塔组织。尤其是在1997年米格尔·安赫尔·布兰科(Miguel Ángel Blanco)议员被害事件^[20]后,西班牙政府更是逮捕了大批埃塔成员,迫使该组织于1998年9月一度宣布停火。但是,仅在一年多之后,埃塔就在1999年12月制造了3起暗杀事件。此后,2000年9月,西班牙政府逮捕了20多名埃塔骨干成员和8名杀手,法国警方也捕获了西班牙警方多年来通缉的埃塔头目之一阿雷齐。2001年,西班牙警方一举摧毁了埃塔的17支突击队,沉重打击了这一恐怖组织。

在对埃塔进行坚决打击的同时,民主改革后的历届西班牙政府对宪法赋予巴斯克人的自治权都表现出了应有的坚守与尊重;并且每当埃塔组织提出停火,西班牙政府都表现出了适度的善意。民主改革后,巴斯克地区有了较高的自治权。巴斯克的自治权包括税收、开办国立的以巴斯克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等等,这些是西班牙政府将巴斯克人逐渐融入西班牙民族大家庭的有力措施。^[21]1996年,西班牙政府还在贸易和地方政府权力方面对巴斯克地区做出了重大让步。

多年来,埃塔曾数次宣布“停火”,西班牙政府对此都采取了积极的步骤。两者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始于1981年,此后,作为政治—军事组织的埃塔解散,但是作为纯粹军事组织的埃塔分支开始了其暴力活动。

1988年、1996年,埃塔曾两次主动同西班牙政府接触,但都在不久之后就实施了恐怖行动。1998年,埃塔在西班牙政府的强力打击下,于9月16日宣布无限期停火。西班牙政府与其在1999年5月开始了正式谈判。但在同年12月,埃塔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系列暗杀事件。虽然西班牙政府与埃塔的联系全部因后者暴力活动而告失败,但是,这一系列的接触却使西班牙社会各界都认清了埃塔的暴力本性,对其深恶痛绝。

“9·11”事件后,埃塔组织被欧盟国家明确列为恐怖主义组织。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强大反恐压力下,埃塔组织宣布从2006年3月24日起实施永久停火。这在西班牙是个非常重大的消息。当地的所有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播发了这一消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首相表示,希望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团结一致,在不丧失政治原则的前提下,为实现和平而共同努力。^[22]而主要的反对党——人民党(Partido Popular)在经过短暂的反对后,也对政府的立场表示了谨慎的支持。

2006年6月,萨帕特罗政府开始了与埃塔的谈判。但埃塔坚持巴斯克地区彻底独立的主张,这使得谈判于同年8月陷入僵局。埃塔随后在巴斯克地区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活动和示威游行。2006年12月30日,埃塔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机场新建的四号航站楼制造了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谈判再次失败。

2009年6月到8月间,埃塔为纪念其建立50周年,更是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2009年6月,一名正调查“埃塔”的警官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23]7月29日,西班牙北部城市布尔戈斯(Burgos)一处民防部队营房遭汽车炸弹袭击,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数十人受伤。此后,西班牙地中海避暑胜地马略卡岛(Isla Mallorca)此起彼伏地接连发生5起恐怖爆炸。埃塔于8月9日声称这一系列爆炸均系其所为。

四、对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的几点思考

自西班牙民主改革以来,巴斯克极端民族分离主义一直是西班牙国内政治生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对待正当的民族自治要求,应当采取各民族平等协商、在宪法框架内加以妥善处理的办法来解决。但对待极端的民族分离势力,尤其是由此滋生的恐怖主义组织,和谈显然只能是权宜之计;而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是不能拿来“权宜”的。应当通过严厉打击削弱其力量;同时妥善解决少数民族问题,铲除

极端分离主义的生存空间。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如上文所述,埃塔问题源于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自1979年《巴斯克地区自治章程》实施后,除“埃塔”和极少数极右翼势力外,西班牙社会各界都对这一《章程》表示满意。并且,巴斯克的恐怖主义活动不仅起因于民族问题,它也是西班牙社会经济矛盾的一种反映,自然不可能单纯依靠民族政策加以解决。通过对巴斯克民族主义问题的梳理,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少数民族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消解民族分离主义情绪。事实上,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地方经济长期大大优于西班牙主体民族地区。恰恰是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巴斯克人的民族优越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分离主义情绪的加强。当然,全世界范围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普遍落后和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落后,更是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温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4]这里提到的“发展程度”,在逻辑上也必然包括少数民族经济大大优于主体民族经济的情况。

其次,极权统治是导致民族分离主义极端化的重要诱因。客观地看,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离主义情绪。但是,相当一部分极端化了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都与中央政府极权统治有关。埃塔建立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佛朗哥政府的独裁统治。并且,也正是由于佛朗哥政权不顾西班牙巴斯克人的民族历史与现实而强制推行的同化政策,导致了在近20年的时间里,埃塔在巴斯克地区受到了广泛的支持。需要强调的是,极权统治是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极端化的重要诱因,但不是惟一诱因。个别极端分离主义势力往往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与境外颠覆势力相互勾结,妄图在民主国家内部煽动民族情绪、破坏民族团结,达到颠覆国家的政治目的。这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

第三,充分尊重历史与现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的关键所在。具体到西班牙的情况,一方面,1978年宪法将西班牙的三个历史事实结合到了一起:第一个事实是西班牙民族统一性和西班牙国家;第二个事实是民族差异性,那些视自己的过去与文化为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构成的领土因素;第三个事实是地区,具有不同的过去和个性的跨省的领土单位。^[25]另一方面,佛朗哥去世后的西班牙社会政治形

势具有很强的分异性。佛朗哥集权主义者、民族分裂势力和西班牙主义者相互之间如果不能达成妥协,无疑将会给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带来政治灾难,甚或内战。调和各派力量同样需要这样一种地区自治制度。应当看到,西班牙民族自治制度建立以来,在调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和和共同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表现出了卓越的制度生命力。

第四,寄希望于与恐怖主义者和谈,无异于抱薪救火。从西班牙政府与埃塔恐怖主义组织和谈的历史来看,恐怖主义组织提出所谓的“停火”、“和谈”要求无外乎是其应对巨大政治和军事压力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条件许可,埃塔便立即恢复暴力行动。当然,作为政治操作,为了揭露恐怖主义组织的虚伪本质,适当的政治接触是必需的,但任何寄希望于此的想法都是非常幼稚的。对待恐怖主义,只能采取一方面铲除其滋生土壤,另一方面坚决进行打击的政策。

当前形势下,通过适当的话语方式加强国家作为各民族政治认同中心的功能,是解决民族认同问题的关键。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对本民族的效忠情绪。但是,政治国家同样可以成为人们的认同中心。1808年拿破仑大军入侵西班牙时,包括巴斯克人在内的西班牙各族人民都燃起了“西班牙民族”同一性的火焰。作为欧洲移民后裔的“美利坚民族”,更是在对国家的共同认同中形成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加强国家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对于消解民族分离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 [1] Ignacio Arana Pérez,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del País Vasco*, 2009, 03, véase el(伊格纳西奥·阿拉纳·佩雷斯:《巴斯克当代史》),转引自 <http://ocw.edu.es/humanidades/historia-contemporanea-del-pais-vasco>.
- [2] [美]房龙:《人类的家园》[M],姜鸿舒、郝彩虹译,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 [3] J. Alcaide y P. Alcaide: “Avance de las magnitud económicas en 2001 y serie provisional del Balance económico Regional, Años 1995 a 2001”, Cuadernos de Información Económica, 167, Marzo Abril, 2002. (J.阿尔凯德, P.阿尔凯德:《2001年的经济规模的进展与区域经济平衡》,参见《经济信息资料(167号)》2002年3月—4月。)
- [4] 钟如熊:《从马克思主义来看民族主义》[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8期。
- [5] [美]D·J·格林伍德:《西班牙巴斯克人民族性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J],王胜林译,《世界民族》1981年12月。
- [6] San Sebastián, “Eusko Ikaskuntza: Fueros Viejo de 1452” in

Fuentes jurídica medievales del Señorío de Vizcaya, 1986. (圣·塞瓦斯蒂安:《巴斯克研究:1452年的福埃罗斯制度》,载于《中世纪比斯开的合法性来源》,1986年版,第8页。另:Eusko Ikaskuntza是西班牙巴斯克语,而非西班牙语。)

- [7] 同[5]
- [8] M. Almagro Basch: *Origen y formación del Pueblo Hispano*, Ediciones Vergara, Barcelona, 1958. (阿尔马格罗·巴西:《西班牙民族的起源》,巴塞罗那,1958年版,第59页。)
- [9] 卡尔罗斯战争是一场支持唐·卡尔罗斯继承西班牙王位的社会政治运动。
- [10] Alfonso Bullón de Mendoza Gómez de Valugera: *La Primera Guerra Carlista*.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 Facultad de Geografía e Historia, Departamento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1991. (阿方索·布伦·门多萨·戈麦兹·巴卢赫拉:《第一次卡尔罗斯战争》,马德里阿尔卡拉大学地理历史系当代历史部1991年整理出版,第39页。)
- [11] 金涛、孙运来:《世界民族主义概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287页。
- [12] 同[5]
- [13] 曹国建:《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J],《世界知识》1982年第10期。
- [14] 杨恕、续建宜:《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的历史由来及其发展》[J],《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
- [15] 刘波:《西班牙民主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访西班牙学者帕洛马·阿吉拉尔》[J],《经济观察报》2007年10月15日。
- [16] F. Coverdale,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Spain after Franco*, New York, 1979, p.123.
- [17] 参见申义怀:《罪恶昭彰话“埃塔”》(上、下)[J],《世界知识》2000年第17、18期。
- [18] 参见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M],时事出版社,2001版,第263页。
- [19] 吴飒:《巴斯克民族主义的成因与埃塔的演变》[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3年增刊,第79页。
- [20] 埃塔绑架布兰科议员,以此要挟西班牙政府释放大批在押埃塔成员,遭到拒绝后,杀害了布兰科。
- [21] 杜洁:《论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离主义的历史背景、特征及其发展趋势》[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年12月。
- [22] 张金江:《西班牙:“埃塔”宣布永久停火》[N],《人民日报》2006年3月24日。
- [23] F. Lázaro, L. Iglesias, R. L. de Calle, “ETA mata a un jefe del grupo de seguimiento a terroristas”, *El Mundo*, 19 de junio de 2009. (F. 拉萨罗, L. 伊格莱西阿斯, R. L. 代·卡雷哈:《埃塔恐怖主义组织杀害警务官员》[N],《世界报》2009年6月19日。)
-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 [25] [西]胡安·巴勃罗·福西著:《西班牙民族主义问题及民族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建立》[J],朱伦摘译,《世界民族》1993年第2期,第1页。

作者简介:肖晞,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法学博士。(长春,130012)

杨晨曦,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2010级博士研究生。(长春,130012)

收稿日期:2010-05-25

修改日期:2010-06-23

the coexistence of realist, liberalist and constructivist schools. In comparison with collective security, quasi-allianc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alliance seems to be various in expression, but remains a unique model of security arrangement, featuring five fundamental attributes. The five attributes are the major criteria to evaluate allianc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rigorous definition of alliance is the prerequisite to judge a state's hard and soft power, and to understand each state's position in the world power system.

59 Marx and Engels' Theory ab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Liu Chuanchu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Marx and Engels regarded the nation-state as the main acto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holding on firmly the inner identity between nation-state and productive methods of Capitalism, putting forward a scientific and original theory ab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ich is the origi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Guided by this theory, China has striven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ystem with democracy, diversity and Win-win as main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goal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63 A Study on Basque Nationalism in Spain *by Xiao Xi & Yang Chenxi*

The issue of Basque nationalism in Spain is long existing and is deeply rooted in profound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e nationalistic complex of the Basque people has been further deepened by its unique history. To a large extent, this issue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policies towards the Basque areas held by the ruling class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by the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government. ETA, established in the time of Franco's totalitarian rule, has already become the biggest malignant tumour outside the present Spanish autonomism. This essay makes a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n the orig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Basque nationalism in Spain, and on such basis, the author comes up with several reasonable reflections.

69 Religious Ethical Morality and American Diplomacy *by Yang Weidong*

Religion is the basis of ethical morality in America and the Puritan view of ethical morality makes America to regard itself as the avatar of justice and morality, which enables it to burden the obligation of punishing crime and evil. Such view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views of the world, and also has certain impact on American diplomacy. Realism and liberalism, however, differ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such view of ethical morality in American diplomacy. As far as the school of realism is concerned, the religious ethical morality in American diplomacy is a kind of utopianism, however, in the opinion of the school of liberalism America really has some ethical morality complex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5 An Analysis of the Two Ukrain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Ukrainian Domestic Political Crisis *by Zhu Shi*

The fourth presidential election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was held on October 31, 2004. The dispute led to the pro-west leader Viktor Yushchenko taking office. Because people in Ukraine were weary of endless political struggles and dissatisfied with the decline of living standard, the loser of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Viktor Yanukovich became the winner in 201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se two elections reflected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in Ukraine due to historic, economic and religious reasons: the west is mainly agricultural area, part of which originally belonged to Austriar-Hungarian empire, and most residents believe in Catholicism; the east is Ukraine's industrial base, in which steel, coal, chemical and munitions industries are concentrated, and most residents are followers of the Orthodox Eastern Church.